溫家寶追憶胡耀邦的政治意涵

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Wen Jiabao's Article in Memory of Hu Yaobang

關向光（Guan, Xiang-Guang）

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

2010 年 4 月 15 日，《人民日報》第二版頭條刊出中共總理溫家寶署名的〈再回興義憶耀邦〉，引起廣泛的報導。《人民日報》刊出溫家寶的這篇回憶文章，究竟有何政治意涵？而僅憑一篇三千字的文章，能做多少評斷，在中共未有接續動作之前，實在難以確定。

英國學者班國瑞（Gregor Benton）長年研究中共歷史，曾歸結出一個心得，大意是：「中共看待過去，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，不在於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本身，而在於該事件或人物是否符合當前需要。當政府的目標有了改變，由黨所控制的報刊，就會連篇累牘地製造新的傳統，並更新舊的傳統。」這話的前半段簡單講就是「古為今用」、「歷史為政治服務」；這話的後半段指的是，當中共要突出或改寫某段歷史的時候，報刊會有密集的討論和宣導。胡耀邦在 1987 年以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」的罪名下臺，在胡逝世 21 周年之際，中共是否有利用胡耀邦為現實服務的跡象，中共報刊是否有密集的評論文章出現，這是我們首先要觀察的。而對歷史的利用，除製造新傳統、更新舊傳統，是否還有召喚舊傳統的一面，也值得注意。

有人認為溫家寶的三千字文章純粹只是「表演」，但沒有解釋為何要在這個時候寫文章來表演。政治人物少有不表演的，可是即使表演，也有前後一致與反覆無常、言行不一、前後矛盾之別，一以貫之的表演無疑的更為困難。溫家寶以及中共機關報，為何選在胡逝世 21 年之際發表這篇文章，不是「表演說」所能回答的。至於說溫家寶就是擅長表演，憶胡文章隻字不提民主化，只

會「到處勘災和掉淚」，而沒有真正解決民眾問題，更是文不對題。

有新聞下標題的時候，用了「脫鉤」二字，謂溫家寶文章的出臺，表示中共已將胡耀邦與六四脫鉤，而所謂脫鉤，意即中共不再擔心會因為提及胡耀邦而讓人聯想到「六四」。但若講脫鉤，則中共早在 2005 年就已為之，不是現在才做。2005 年 11 月，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，紀念胡耀邦誕辰 90 周年，中共總理溫家寶出席，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發表講話。同一個月，由人民出版社與中共黨史出版社共同出版的《胡耀邦傳》第一卷，以及胡耀邦女兒滿妹親撰的《思念依然無盡—回憶父親胡耀邦》都得以出版。胡滿妹的書稿早在 1999 年即已脫稿，等待 6 年才終於出版，自然有著特殊意義。接著在 12 月，共青團機關報《中國青年報》也刊出該報在胡耀邦過世 16 年後的首篇紀念文章，由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、政協副主席的胡啟立撰文。以上事例表明，縱使因胡耀邦之逝而點燃「六四學運」，使得胡耀邦的名字變成「敏感詞」，但過了 16 年，中共就已經不覺得談論胡耀邦是有害的了。因此，認為溫家寶文章代表中共將胡耀邦與「六四」脫鉤，可能也沒擊中靶心。更何況，鄧小平時代下臺的兩位中共總書記，胡、趙的過錯有輕有重，胡主要是失去鄧小平和其他老人的信任，而趙的罪名則嚴重得多；胡下臺後仍保留著政治局委員，趙則連中央委員都保不住；胡雖然在 1987 年下臺，但中共高層對其評價並非一無是處，也沒有什麼人事上的牽連。胡錦濤、溫家寶均曾獲胡耀邦提拔，可是胡耀邦的下臺並不影響胡、溫兩人的仕途，即是明證。所以溫家寶在中共中央紀念胡耀邦誕辰 90 周年座談會之後的 5 年，為文發表於《人民日報》，並不是違反常情的事。

也有人進一步猜測，溫家寶此文是否表示中共準備平反胡耀邦？的確，中共要改寫歷史，或平反一個重量級的人物時，會先釋放若干訊息，然而，僅是溫家寶一篇追憶文章，實在不能做為中共將要平反胡耀邦的充分根據。

鄧小平跟毛澤東一樣，親自指定的接班人只要違逆其意，都遭到整肅的命運。不同的是，毛時代的權力鬥爭達到生死存亡的激烈程度，鄧時代則相對溫和。劉少奇被鬥爭開除出黨，加上一長串的嚴重罪名後病死開封，火化證明書寫的是假名劉衛黃；林彪則在毛的步步進逼下出亡摔機而死，死後仍然有一長串的罪名緊隨其後。胡耀邦和趙紫陽下臺後，胡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位，趙還得以在軟禁中接受記者訪問，並得以終老。毛澤東時代，垮掉的接班人的命運極其悲慘；鄧小平時代至少沒有這樣地趕盡殺絕。然而，在中共黨內，

胡、趙二人畢竟是因為犯了「嚴重錯誤」而下臺，其去職既是中共中央高層集體決定，其平反也需中共中央高層集體做出。此外，中共對冤假錯案的平反有一定的程序，職位愈高，罪名愈重，則平反就愈費時費力，相應的就有了比較容易觀察的跡象。劉少奇案與林彪案發生時，當時的中共對劉、林二人是澈底否定；鄧小平時期對胡耀邦與趙紫陽，則是有保留地否定，但這並不表示胡、趙二人的平反之路就很容易，僅從溫文，仍然看不出來胡耀邦的平反列車已經啟動。

必須注意的是，胡、趙二人的下臺牽涉到鄧小平，若要加以平反，首先就要承認鄧小平犯了錯誤，而這是鄧小平時代開始以迄今天，極為困難的事。實際上，評鄧比起評毛要困難許多。可以說，在中共將毛澤東請下神壇的同時，卻又製造了「鄧小平神話」。毛澤東過世 5 年，中共就可以做出「三七開」的「評毛歷史決議」；鄧小平過世已長達 13 年，中共卻仍然無法對鄧的一生蓋棺論定，尤其是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期強力執行反右運動與推動「大躍進」的功過是非，中共官方仍然諱莫如深，這也因而耽誤中央文獻研究室／出版社對《鄧小平傳》的出版。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說是中共官方最權威的黨史人物撰寫重鎮，僅以中央文獻研究室所出傳記而論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劉少奇、陳雲、李先念、李富春、習仲勛等人都有立傳，獨獨鄧小平傳遲遲未能出版，難道鄧的重要性比不上陳雲、李先念，甚至李富春和習仲勛？而鄧小平女兒鄧榕（毛毛）為其父作傳，也完全略過鄧小平最有爭議的時期，原因不外是鄧小平牽涉的重要事件「不好講」。一方面由於鄧小平已被豎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，於今日中國的快速發展有絕對功績；另一方面則由於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的連續兩任總書記，皆為鄧小平指定，故至少在胡錦濤任期結束之前，中共確實不方便如同評毛一般地評鄧，但若不正式評鄧，且斷定鄧在重大決策上有明顯的過失，則胡、趙的平反就不太可能。

如果不從政治表演、與「六四」脫鈎、人物平反等角度去看，不刻意找出弦外之音，就可以發現溫家寶此文不過是重申「群眾路線」精神，而溫家寶所轉述胡耀邦的指示（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，體察群眾疾苦，傾聽群眾呼聲，掌握第一手材料。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，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），正與 2002 年 12 月胡錦濤甫接任總書記不久，立即到中共建政前夕最後一個「農村指揮所」西柏坡考察時的講話是相同的（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深入基層、深入群眾，傾聽群眾呼聲，關心群眾疾苦，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

冷暖掛在心上)，與胡啟立 5 年前的悼念文章精神相通（耀邦同志非常注重在基層調查研究，一有機會就往工廠、農村跑，到群眾中瞭解真實情況，體察群眾的疾苦，摸清群眾的情緒，傾聽群眾的呼聲)，更與中共革命的「優良傳統」一脈相承。群眾路線原本是中共被迫從城市轉移至農村幹革命時，為獲得當地民眾支持的生存策略，強調的是精英與群眾的面對面溝通，幹部必須勤於下鄉調查研究，以獲得第一手的民情資料，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後面盲目主觀地紙上談兵、發號施令，以致脫離群眾，招惹民怨，甚至帶來不可收拾的後果；幹部也必須「堅苦奮鬥」，為民表率，以圖影響群眾，這種幹部工作作風的要求和方法，後來逐漸演化成幹部守則，更成為「毛澤東思想」的重要內容，且在 1981 年重新定義「毛澤東思想」為「集體智慧結晶」時保留下來，與實事求是、獨立自主並列為「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」的三個基本方面，也是銜接過去與現在的中共黨的重要革命傳統。

自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雖然在經濟自由化之下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長足發展，但走向富裕的副作用則是物質誘惑的增加，「拜金主義、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滋長蔓延，權力、金錢、美色的誘惑在考驗著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」(借用胡錦濤語)，中共雖然屢屢祭出反腐敗鬥爭大旗，試圖以法制約束黨的幹部行為，成效卻總是有限。固然群眾路線必須依賴良好的幹部，若無制度監督，則其效果就依人而定。但鑒於中共政治體制仍然具有高度的人治色彩，在法制無法有效約束幹部時，不時的強調群眾路線，就成為不得不求的良方妙藥。這是為什麼在鄧小平進行改革之後，中共高層仍然不斷訴諸群眾路線的緣故，它既是告誡，也是道德勸說，目的在求彌補法制之不足。毛澤東爭議過大姑且不論，毛時期的周恩來、劉少奇都是群眾路線的表率，改革後的胡耀邦，更是力行群眾路線的典型，而與胡耀邦同樣是共青團系的胡錦濤和溫家寶，也莫敢或忘群眾路線；唯有高舉典型，並且以身作則，身體力行，才有望繼續爭取民心，為中共政權增加統治的正當性。不過，除了黨內監督，進行反腐敗鬥爭，訴諸群眾路線的老傳統，真正能對症下藥，解決幹部貪腐問題的是建設獨立的監督機制，以及伴隨開放言論自由而來的輿論監督。

總之，中共機關報《人民日報》於胡耀邦逝世 21 周年刊出溫家寶追憶文章，在沒有其他佐證資料支持之前，實難妄加評斷。從政治表演、與「六四」脫鉤、平反的先兆，甚至中共高層內部政爭的角度解讀溫文，都嫌證據力不足。在未有更多證據出現之前，吾人不妨暫且拋開種種揣測，專注追憶文章的內容，或許是較為允當的做法。